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周 琪

内容提要: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关键词: 美日同盟 美日安全合作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 周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人们公认,当前和未来的全球安全和稳定会受到在东北亚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而对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产生最大影响的,则莫过于中、美、日这三个国家。在这个战略三角关系中,每一个国家都受到另外两个国家关系的影响。美国对日政策不仅会影响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而且也会影响中日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后冷战时期表现得愈发明显。同样,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会影响其与日本的关系,同时会影响中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并不愿

意看到这一地区中的大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对抗，因为这可能严重限制美国地区安全政策的灵活性，甚至可能把美国拖入同中国的对抗或冲突之中。本文将从历史角度分析当前美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时期美日安全合作与中、美、日关系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占领，并于1946年强加给日本一部使其非军事化的战后宪法。然而，没过多久，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开始对这一战略感到后悔。¹ 虽然宪法的和平保证可以防止日本再次军国主义化，但是由于从1950年起美国改变了在世界范围内同共产主义对抗的优先考虑，因此美国宁愿日本把大量资源投入军事开支以支援美国的全球战略。² 美国先是在1949年“丢失了中国”，尔后又发生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美国在亚洲推行遏制政策、建立联盟体系的导火索。”这个联盟体系是“轴心—辐条”式的。在东北亚，1950年美国同韩国建立了安全同盟，1951年同日本建立了安全同盟，1954年同中国台湾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美国与日本进行《相互防卫援助协定》的谈判，寻求其对亚洲遏制战略的支持。这一协定给予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根据该协定，美日双方在领土受到武装攻击时有责任相互援助。然而，由于日本宪法第九条款的限制，日本不可能为了防卫美国向海外派遣其武装部队，特别是宪法还禁止日本建立陆、海、空三军。美国必须从事实上承担单方面防卫日本的责任。宪法还声明：“永远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³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说服了日本建立自卫队。1954年，吉田首相在议会强行通过《自卫队基本法》。日本政府辩解说，建立自卫队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仅仅是为了自卫，这与宪法第九条款的规定并不矛盾。政府

¹ David Arase, “Japan, the Active State? Security Policy after 9/11”, *Asian Survey*, Vol. 47, No. 4, July/August 2007, p. 563.

² Frances Rosenbluth, Jun Saito, and Annalisa Zimm, “America’s Policy towards East Asia, How it Looks from Japan”, *Asian Survey*, Vol. 47, No. 4, July/August 2007, p. 594

³ 虽然在全球来说，冷战始于1947年美国的杜鲁门政府以希腊和土耳其受到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为由对他们提供援助，但是对亚洲地区来说，朝鲜战争是美国遏制政策的开始。

⁴ [日本]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31页。

的内阁法制局决定，自卫队只能被用于自卫（即对日本本土的防卫）；不能用于集体防卫（即不能以其他国家的名义或根据其他国家的利益采取军事行动）；不拥有进攻性武器；不向海外派遣军队。这就防止了日本使用自卫队在其领土之外进行防卫。

在冷战背景下，为了同共产主义对抗，美国一心把日本留在西方阵营，恢复日本经济和把日本拉入西方集团成为美国的重大目标。为此，美国向日本商品开放了本国市场，使日本能够很容易地获得美国的技术推移，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并允许日本加入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¹ 而此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为了尽快获得美国的援助以恢复日本濒于崩溃的经济，也积极迎合和追随美国的战略目标，为美国的亚洲战略提供了便利。

吉田茂把对美协调政策当作日本外交的基本支柱，并为此政策辩护说，以美国驻军为中心的战后日美关系可以对日本安全起积极的作用。也正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吉田茂选择了中国台湾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战争媾和对象，使得在此后的 20 年中没有一届日本政府能够打破这一禁忌而承认中国政府。² 吉田主义要求日本采取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立场，以此换取军事保护，这将以日本放弃自主为代价。另一方面，吉田茂借助于美国为日本制定的宪法和公众的支持，拒绝美国使日本重新军事化的要求，对宪法做出了和平主义解释，对扩大军队和国防工业实行自我限制，把“防卫性国防”当作日本国防政策的核心信条。³ 为了进行经济重建，吉田茂要求尽可能少地把资金花费在国防开支上，同时尽可能使美国情愿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⁴ 用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戴维·阿拉斯 (David Arase) 的话来说，吉田主义使日本被动地依赖于美国，发挥最小的安全作用，采取低姿态的外交，把民族主义引向追赶西方经济发展的努力。⁵ 换言之，吉田茂和日本其他保守主义

¹ Yoneyuki Sugita, "Enigma of U. S - Japan Relations in the 1950s",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30, No. 30, 2002, p. 478.

² [日本]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第 731 页；康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2 页。

³ Richard J. Samuels, "Japan's Goldilocks Strateg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4, Autumn 2006, p. 113

⁴ Frances Rosenbluth, Jun Saito, and Annalisa Zinn, "America's Policy towards East Asia, How it Looks from Japan", p. 594

⁵ David Arase, "Japan, the Active State? Security Policy after 9/11", p. 575

精英把和平主义看作是日本经济恢复之前使国家自主最大化手段。在整个冷战时期，虽然有来自美国的压力，但日本始终奉行吉田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在美国为日本承担防卫责任的背景下，日本得以在整个战后时期把国防上的开支保持在GDP的1%以下。

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以及经济和安全援助下，日本开始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使日本得到了前者大量的军事援助。1954年，由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开支和对日援助，日本实现了与美国之间的国际收支盈余。吉田首相希望日本获得相对自由来追求同中国的商业关系。¹他表示：“对于日本来说，如果不能与中国大量进行贸易就很难有日本的经济自立。”²但此时中美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特别是由于在1954年9月发生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美国与中国台湾随即缔结了《共同防务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的改善是不可能的。此后，在坚定反共的岸信介首相任职期间，中日关系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然而，进入60年代后，当中苏关系趋于恶化，中美之间开始寻求和解时，日本获得机会来寻求中日关系的改善，为日本产品寻找海外市场。其方法是采取“政治经济分离的政策”，即搁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关系，只发展贸易关系。”美国在自己不同中国大陆进行接触的情况下，也不允许日本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面对美国的干涉，当时的池田勇人首相表现出了少有的强硬态度，外务省发表了如下看法：“日本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这是日本的既定政策，所以没有必要特别在意美国的政策。中日贸易是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也是与西欧对华贸易相同的。在此范围内进行贸易，没有必要进行改变。”³ 时任大藏大臣的田中角荣也表示：“日本不打算改变现行的方针，关于对华贸易池田内阁也同样没有变更的打算。”⁴

从中国方面来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领导人试图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和解放台湾上。但是，朝鲜战争、美国在日、韩驻军

¹ Michael J. Green, “Japan is Back: Why Tokyo’s New Assertiveness is Good for Washington”,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2, March/April 2007, p. 144

² 日本《外务省外文资料》（第一卷），A-1503，第543页，转引自康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第123页。

» 康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第166页。

³ 转引自康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第178页。

⁴ 同上。

以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迫使中国成为苏联在亚洲地区同美国抗衡的伙伴。然而，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趋于恶化，中美之间形成了抵制苏联扩张的战略伙伴关系，台湾问题实际上被留待以后解决。到70年代末，尽管中美关系不断经历起伏，两国还是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且两国之间的某种战略合作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

当美国开始从越南脱身时，为了回报，日本暂时不要求把冲绳归还给日本，在1969年《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中，美日两国表示：没有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无法充分维持日本的安全；在涉及包括日本在内的远东和平与安全事项以及有关安全条约的实施问题上，美国将同日本密切磋商。在尼克松主义中，美国明确示意其盟国承担更多的自卫责任，特别是日本。对此，佐藤荣作首相的回应是号召“自主防卫”，这极大地改变了1957年的“基本政策”，变为日本为自己提供主要防卫。但是，扩大军备建设的计划在国民中受到了广泛的批评。¹

至此，尽管日本在战后曾经试图与中国接近，但由于美国的反对，中日两国之间始终没能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贸易也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在此背景下，当1972年中美之间通过秘密接触走上两国关系改善之路时，日本政府感到极度震惊和寒心。此时，日本开始担心它将失去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盟国的地位。为了避免被孤立，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日本很快采取行动，先于美国在1972年9月与中国正式建交。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和日本的领导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确保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上，两国的经济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日本对华贸易和投资迅速增长。日本于1979年开始给予中国官方发展援助。

从70年代初到1989年，在中国同美国保持较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同时，中国和日本也保持了较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根据傅高仪的观点，1972年到1989年是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黄金时期”，虽然这期间三个国家的双边关系并非没有问题，但还是维持了相当稳定的关系。² 麦克·M·望月 (Mike M. Mochizuki) 也称这个时期为日本对华“友谊外交的时

¹ David Arase, “Japan, the Active State? Security Policy after 9/11”, p. 565

² See Ezra F. Vogel, Yuan Ming and Tanaka Akihiko, eds., *The Golden Age of the U.S. - China-Japan Triangle, 1972-1989*,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傅高仪主编的这本书的书名就说明了他的观点。

代”，即日本“追求对中国的合作与和解政策”的时期。¹ 中国实际上把美日同盟看作是地区稳定的积极因素，因为美国的安全保护使得日本没有理由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² 然而，从这一时期后期起，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国民对日本的反感和不信任逐步表面化，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不断引起中国的批评。不过，由于中国同美国在反对苏联扩张方面的共同利益，这些因素只是偶尔会对中日政治和安全关系产生影响。同时，美国对日本承担更大的防卫责任的要求，也将对此产生作用。

在经济方面，6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1965年日本改变了对美国贸易的不平衡，第一次在对美贸易中实现顺差。自此，美国开始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其开放市场。70~80年代，这种压力逐渐加强。不过，尽管较为严重的贸易摩擦时有发生，但由于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只有在美国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时，美国国内对日本的批评才可能影响美日关系。总的来说，贸易争执并没有严重影响美日安全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进一步要求日本在世界上担负更大的作用和责任，在这种压力下，日本提出了大平正芳首相所设想的“捍卫和平的全面安全和防卫战略”。根据这一战略，日本寻求在更加互惠和自主基础上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作。此后，日本更加留意支持美国在国际上的行动。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日本迅速宣布对苏联的制裁。1982年，当中曾根康弘当选首相时，美日在世界事务上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两国政府进行了密切合作，基于对安全和世界事务的共同看法发展了双方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中曾根向美国领导人保证日本将在亚洲的热点问题上——如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问题——同美国密切协调政策，并同美国一起制定对中国的政策。日本政府还欢迎美国在日本和西太平洋增加兵力，继续稳步建设日本国民自卫队，坚决站在美国一边反对苏联扩张的威胁。在两伊战争期间（1980年~1988年），日本为了支持美国保护在波斯湾油轮的行动，对在波斯湾的导航系统的建设给予了帮助，并对美国在日本的驻军给予了更多的支持，向

¹ Mike M. Mochizuki, “Japan’s Shift Strategy toward the Rise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August-October 2007, p 746

² See 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 S. -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 235

» Camilla T. N. Soerensen, “Strategic ‘Triangularity’ in Northeast Asia: the Sino-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hip and U. S. Policy”, *Asian Perspective*, Vol 30, No 3, 2006, p 106

阿曼和约旦提供了贷款。但是，日本拒绝参加美国在波斯湾的扫雷行动，这在一些美国官员看来是日本不愿同美国在自己没有明显利益的地区进行合作的表现。

冷战结束到九一一前美国对日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双边同盟、安全协议，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等综合因素的制约。可以说，中日关系成为这一地区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一方面，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两国的战略利益却日益相互矛盾。此外，历史问题引起了双方激烈的争论。冷战时期，中日关系受到约束，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约束力消失了。当美国把注意力放在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全球局势，并运用自己在冷战后增长的影响力，推动日本在自己本土范围之外给予美国更大的支持时，中日安全关系便开始恶化。

冷战结束初期，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全球秩序将很快发展成为多极化，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美国将逐步从东北亚撤军，并解除其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¹ 基于此，中国的地区战略在 90 年代初集中在促进多极化，主要是促进地区的双边经济和政治关系上。然而，到 90 年代中期，尤其是从 1995~1996 年台海危机开始，中国逐渐意识到，美国在这个地区和全球的主导地位并没有下降，也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将从东北亚国家撤军，或废除其同日本和韩国的双边同盟。中国开始批评美国的霸权以及美国主导的同盟关系是冷战的遗产，并用促进地区多边主义取代促进多极化。²

中国处理周边关系方法的改变和经济的迅速发展逐渐提高了其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声誉和地位，此时，日本经济却步入了停滞阶段。在冷战时期，日本曾是地区经济的中心，没有被其他亚洲国家视为军事上的威胁。然而，到 90 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日本经济发展速度的下滑，日本对

¹ 关于中国对冷战后世界的看法，参见 Yong Deng and Feiling Wang, eds., *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 China Views the Worl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 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 S. -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pp. 76-78, 80-83

² David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 S. - 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p. 76, 232-233

地区安全环境的看法开始发生转变。

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安全背景，美国不再有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的迫切需要，因而日本担心，美国可能因此放弃对日本的防卫。¹ 有人分析说，其担心的原因一是由于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美日之间的贸易争端，二是由于美国在 90 年代初越来越多地批评日本在安全方面搭便车。² 但此时，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美国来确保其石油供应、处理冷战后出现的地区紧张状态，因此它要努力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上紧紧地追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J. 萨缪尔斯 (Richard J. Samuels) 指出：“它（日本）在处理可能被美国抛弃的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是尽可能抱紧美国。”³

20 世纪 90 年代起，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更需要日本来为其全球战略提供支持，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伊拉克 1990 年入侵科威特之后，美国要求日本参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行动，海部俊树首相此时想要把自卫队派遣到伊拉克，但是相关法案未能在议会中获得通过。随后，日本为战争提供了 130 亿美元的援助，但是这一次，传统的“支票本外交”已不再令美国满意。⁴ 来自美国和美国之外的不断批评引发了一个问题：日本是否需要参与维持和平与稳定的行动？日本向海外派兵将与宪法的第九条款发生矛盾，为此日本于 1992 年通过了《国际和平合作法》，该法允许日本自卫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框架下同其他国家一起行动。这打破了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法律和心理障碍。

¹ 戴维·阿拉斯分析说，日本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战略变化以及给日本的压力所造成的。新的单极结构给了美国更大的抛弃日本自由，美日相互需要的变化也给了美国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这导致日美安全政策发生了微妙但重要的变化，参见 David Arase, “Japan, the Active State? Security Policy after 9/11”, p. 568 不少美国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例如理查德·萨缪尔斯认为，可能被美国抛弃是日本外交追求军事现代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参见 Richard J. Samuels, “Japan’s Goldilocks Strategy”, p. 120 卡米拉·索伦森也认为，90 年代日本开始担心美国将可能放弃对它的安全保障，参见 Camilla T. N. Soerensen, “Strategic ‘Triangularity’ in Northeast Asia: the Sino-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hip and U. S. Policy”, p. 111

² Camilla T. N. Soerensen, “Strategic ‘Triangularity’ in Northeast Asia: the Sino-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hip and U. S. Policy”, p. 114

³ Richard J. Samuels, “Japan’s Goldilocks Strategy”, p. 120

⁴ Tomohito Shinoda, *Koizumi Diplomacy: Japan’s Kantei Approach to Foreign and Defense Affair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pp. 51-55

此后，日本参与了在联合国名义下的一系列维和行动，包括在柬埔寨、莫桑比克、东帝汶等地。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和军力的增强以及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威胁，也是日本改变外交和军事战略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增强了日本的不安全感，导致其开始加强美日同盟作为应对手段。朝鲜核危机使美国有了更多的理由来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它承担地区安全作用。1993年朝鲜成功试验了可以打击日本本土的“劳动”（Nodong）型导弹，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开始发展核材料。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委派前总统卡特进行协调，化解了这次朝鲜核危机，最后达成了1994年《日内瓦框架协议》（Geneva Framework Agreement）。¹

从90年代中期起，美国的主导政策开始把同日本的安全关系放在首位，而不顾中国可能产生的看法。自1996年起，在美国的压力之下，美日同盟被重新定义。1996年，克林顿总统和桥本龙太郎在东京签署了《1996年共同安全声明》（the 1996 Joint Security Declaration），打开了日本修改现存双边国防政策指针之路，更加强调《日美安全条约》的第六条款，表明日本将在维护周边地区的安全上起更加积极的作用。

1995年5月，中国进行了自1992年以来的第4次核试验，日本立即提出抗议，但中国在同年8月继续进行了第5次核试验，导致日本冻结了对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1995年和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导弹试验，更使日本确信在中国强大时美日同盟对日本所具有的价值。²

1997年，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改变了美日同盟的性质，使其从以防务为重点的同盟变为“应付远东紧急事态”、“对付周边事态”的同盟。日本还对宪法第九条款做了重新解释，允许自卫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对地区“紧急状况”做出反应，不过只限于参与非战斗行动，如近海游弋、后勤、搜寻和救援、医疗服务以及情报分享。

至此，日本的政治精英开始转而接受在美日同盟中起更大作用的主张，并前所未有地加强了美日同盟，把它当作日本安全政策的核心。一些研究者观察到，在日本国内，公众舆论转向了政治右翼，从而有助于右翼领导人获

¹ David Arase, “Japan, the Active State? Security Policy after 9/11”, p. 567.

² Ibid.

得政治领导地位。这些右翼领导人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主要威胁，要求修改宪法和采取更主动的安全政策。公众舆论也支持这一看法。年轻一代的政治精英更倾向于同中国对抗。¹

1998年8月朝鲜进行了“大浦洞”（Taepodong）弹道导弹试射，这为日本国内那些支持扩大自卫队作用的人提供了另一个理由。日本同意将支持美国在稳定东亚地区中发挥作用，以作为美国保护日本免受周边威胁的回报。日本国内民众的广泛恐慌促使议会通过了《确保日本周边地区局势和平与安全法》，该法授权日本超越《维和行动法》（the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Law）的新责任，允许自卫队处理“地区紧急事态”，甚至在联合国的授权之外行动。1999年日本议会又通过了《国际和平合作法》，它加强了日本在周边地区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后勤支持的能力，表明为了维持同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愿意承担更积极的全球和地区作用。此时，美日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因素——贸易争端——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已取代了日本被看成是对美国最大的经济威胁。

关于这一阶段美国和日本战略关系不对称性的特点，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认为，这一特点依旧存在，虽然在21世纪以前，日本的历任首相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对这一不对称的状况做了五次调整：1960年修正《美日安保条约》；1969年尼克松-佐藤的联合声明对“尼克松冲击”做出反应；1978年制定《防务指南》；1990~1991年对海湾战争做出贡献，1997年出台《防务指南修正》。但是，在这些来自外部的危机中，日本国内还没有一个政党想要推动美日安全关系发生根本变化，日本仍然愿意牺牲部分主权来换取美国对其防卫的承诺，而美国也愿意推动日本承担更多的负担，以维持自己在亚洲更有力的地位和行动自由。²然而，伴随着上述这些调整，日本所承担的自我防卫和地区安全的作用已经明显增大了。

¹ Camilla T. N. Soerensen, “Strategic ‘Triangularity’ in Northeast Asia: the Sin-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hip and U. S. Policy”, p. 114

² Michael Green, “Balance of Power”, in Steven K. Vogel, ed., *U. S. - Jap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2, Chapter 1.

美国反恐战争以来中日关系的变化

在美国 2000 年大选阶段，产生了一份《阿米蒂奇报告》。这是一个非官方的、跨党派的报告。2001 年 2 月起担任布什政府副国务卿的理查德·阿米蒂奇在当年 5 月初访问东京时表示，“缺乏在集体自卫上的共识”是扩大美日安全合作的障碍之一。¹《阿米蒂奇报告》提出，现在是打破旧有的思想框架、推动日本在世界上起更积极的安全和经济作用的时候了。报告认为，日本不能再依赖于“支票本外交”，而应当为全球和平与安全承担更大的风险。报告建议，结束传统战略决策模式，对日本施加压力使其实现自己的诺言，并仿照美英联盟模式来建立美日同盟，在政策和战略形成的最初阶段与日本磋商。美国的目的是要日本参与共同政策的制定，而不仅仅是接受美国的指示。美国将尊重日本对自己的安全政策的选择，但它强烈希望日本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成为一个更平等的同盟伙伴。²《阿米蒂奇报告》成为布什政府的对日政策蓝图，³它所提出的战略也受到东京方面的拥护，并成为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历史上最密切关系的基础。

2001 年 9 月开始的反恐战争影响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加强了美日之间的安全纽带。九一一之后美国要求日本对全球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的立场进一步加强，美国此时把日本看作是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安全伙伴，并敦促日本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布什政府把日本看作是美日关系的基石，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也评论说，美日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⁴在美国重组其全球军事力量的计划中，日本被确定为亚太地区的堡垒及美国陆、海、空军在这一地区的总部。2002 年 12 月

¹ Ralph A. Cossa, “United States Japan: Beyond the Defense Guideline”, Pacific Forum CSIS, June 29, 2001. <http://www.csis.org/media/isis/pubs/pac0126.pdf>

²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Relationship”, INSS Special Report, Oct. 11, 2000 <http://se2.isn.ch/serviceengine>

³ Michael J. Green, “Japan is Back: Why Tokyo’s News Assertiveness is Good for Washington”,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2, March/April 2007, p. 142

⁴ Remarks Delivered at the U. S. - Japan Business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8, 2002, cited from Robert C. Fauver and Devin T. Stewart, “U. S. - 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menting a Geostrategic Economic Relationship”, *SAIS Review*, Vol. 23, No. 2, Summer 2003, p. 24

首次举行的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即第一次由双方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2+2”会议）后的声明强调，美日同盟在确保美日两国安全与繁荣、加强地区及全球和平与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使美日同盟超越亚太地区而具有了全球意义。

日本在美日安全合作中的地位开始由被动接受保护转变为主动参与周边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以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立即表示，反恐将是对付顽强敌人的长期斗争，自由世界必须击败恐怖主义。他很快采取了行动，在日本国内推动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把海上自卫队派遣到印度洋，并为阿富汗的重建慷慨解囊。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日本政府做出决定，对伊拉克的重建工作贡献 50 亿美元，并且还敦促海湾国家依照日本的资助标准行事。日本还向伊拉克派遣了陆上自卫队。这些都表明日本领导人想要显示日本和美国有共同的政策目标，而不仅仅是对美国的要求或倡议做出响应。在 2005 年 10 月宣布《美日同盟：为未来而改变和重组》计划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描述了美日同盟关系的关键性变化：“迄今为止美日同盟是通过使用日本的基地和美国的军力来防卫日本，而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在日美之间各种领域中的共同行动，以便改善世界和平与安全。”¹ 对此，美国国务卿赖斯评论道：“曾经是一个关于日本防卫或地区稳定的关系，已经真正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同盟。”²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日益增长。美国和日本 2005 年 2 月决定把台湾问题纳入美日同盟的战略关注以及美日军事力量的重建计划，加深了中国的担忧和不信任。”中国和韩国把日本政治家对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看作是日本对军国主义的赤裸裸的赞同。小泉当政期间（2001~2006 年）从未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特别是他在 2006 年 8 月 15 日对靖国神社又做了正式参拜，而这一天正是日本投降纪念日，也是亚洲各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中韩两国政府对小泉的每次参拜都提出了抗议，

¹ David Arase, “Japan, the Active State? Security Policy after 9/11”, p. 582

² Remarks with Defense Secretary Donald Rumsfeld, Japanese Minister of State for Defense Yōshinori Ohno, and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Nobutaka Machimura,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29, 2005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5/55775.htm>

» Camilla T. N. Soerensen, “Strategic ‘Triangularity’ in Northeast Asia: the Sino-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hip and U. S. Policy”, p. 112

2005年韩国甚至用正式撤回其驻日大使的方式表示了强烈抗议。¹此外，日本修订历史教科书的行为，也被中国和韩国看作是日本不顾历史上因其军事扩张而受到严重伤害的亚洲人民的感情。2005年4月，日本政府批准新的中学教科书的行为在中国激起了反日示威，同时2500万中国人在网上签名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九一一之前，美国主要是从地区安全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之后，美国把对华政策确定为同中国交往并使之融入国际社会，通过对话和加强地区多边框架来发展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政策有助于确保务实的中、美、日安全关系。九一一以后，美国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发展了同中国的“反恐伙伴关系”，相应地淡化了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对中国的指责。但这只是就全球层面上的中美安全关系而言。在地区层面上，双方对长期意图的相互不信任和战略关系上的冲突仍然主导着两国的安全关系。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部《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和《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都显示了美国政府、特别是国防部，仍将中国视为对美国长期来说最大的安全威胁。

这些发展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安全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此时美国的对日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消极作用。在日本，美国的政策加强了日本的自信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美国的政策导致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日本国内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上升是影响日本安全战略的重要国内因素。如果说，1989年到2001年的12年间，美国运用其在冷战后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动日本在亚太地区给予美国超过日本自己领土范围的更大支持，是受到了一系列国际危机和日本国内保守的民族主义因素推动，但在2001年以后，日本对参与安全问题的不情愿态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了，美国对日本扩大安全作用的压力变得更为有效。²努力改变吉田主义弱点和被动性的右翼追随者同美国的压力结合到一起，更愿意采取极端的措施。这些领导人寻求通过打“美国牌”（即来自美国的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压力）来加强他们在国内关于外交政策辩论中的地位。这些努力在日本新一代的政治家

¹ Frances Rosenbluth, Jun Saito, and Annalisa Zinn, “America’s Policy towards East Asia, How it Looks from Japan”, p. 594

² David Arase, “Japan, the Active State? Security Policy after 9/11”, p. 562

中得以继续。美国的压力这一外部因素对于日本保守主义者推动日本战略的变化而言，既是动力，也是必要条件。总体来说，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图景得到改变，和平主义运动的政治力量有所下降，公众舆论转向政治右翼。这些变化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采取更强硬和更积极的安全姿态的压力，并把右翼民族主义领导人，如石原慎太郎和安倍晋三，推上了政治领导地位。¹

美国开始不仅强调美日之间的共同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强调两者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念基础。2005年11月，布什总统在京都的讲话中强调，美国和日本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方面有共同利益，这些利益能够被扩大到其他国家。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是美日同盟的粘合剂。²日本也开始不仅通过加强美日同盟来提高自己在亚洲的地位，而且在美国的鼓励下，还试图担当亚洲的“思想领袖”。在日本看来，中国只能提供经济发展模式和军事力量，以及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许诺，而日本可以在亚洲提供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

总而言之，美国的安全政策和対日安全合作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日关系，但美国的安全政策并不是中日安全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国和日本的安全观和政策的变化，以及两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加深了双方历史上的不信任和战略利益的冲突。不过，美国的安全政策和対日安全合作政策无疑是中日关系恶化的促进因素。

日本原本的意图是利用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和美日同盟来为其全球安全战略服务。对于美国来说，这种防务安排是极不对称的，美国为日本提供了安全保证，但却没有从日本那里得到同等的安全援助。而现在，美日同盟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在小泉的领导下，日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积极地在国际上行动和准备自卫。日本获得了新的自信，更愿意在同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承担更多的义务，这被一些美国政府官员说成是经历了一个成熟的过程。³

¹ Camilla T. N. Soerensen, "Strategic 'Triangularity' in Northeast Asia: the Sin-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hip and U. S. Policy", p. 114

² Michael Green and Nicholas Szechenyi, "Common Values: A New Agenda for U. S.-Japan for U. S.-Japan Relations",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 No. 2, Summer 2006, p. 47

³ Ibid., p. 50.

⁴ Richard J. Samuels, "Japan's Goldilocks Strategy", p. 116

关键的问题是，中日之间矛盾的加剧是对美国利益的潜在损害。虽然日本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寻求在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但到了小泉政府时期，小泉首相眼中只看到美日同盟和对美外交，而忽略了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致使中日关系、日韩关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对地区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尽管在小泉的领导下，日本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活动者，但与自己近邻的关系却由于历史问题而趋于恶化。

就在中国矛盾似乎看不到缓解的前景时，美国开始感到担忧。2005 年，美国国内对政府的对日政策发出了大量批评声音，指出美国在中日安全关系的恶化方面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一些美国高级官员也在考虑采取可行的措施以缓解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¹ 甚至一些日本学者也意识到，日本同中国的长期紧张状态将在未来给日本带来严重危害，不仅将损害日本在亚洲的地位，还损害美国的战略价值。当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下降时，美国将不愿意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因此日本国内政治和中日关系的紧张状态，会对美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²

2006 年 7 月 5 日，朝鲜进行了导弹试射，10 月 9 日又进行了核试验。11 月 17 日，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与美国布什总统第一次会晤时，表示日本将坚定地承担对美日同盟的责任，并保证将在朝鲜问题和其他地区安全问题上同美国密切合作。这次首脑会晤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它极大地推动了安倍在上任伊始就采取对中国和韩国的务实外交。美国明确表示担心中日之间矛盾加剧，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当日本在地区受到孤立时，不可能有一个强有力的美日同盟，美国需要日本有自己的主动战略来维持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据来自美国国内的观察，布什政府不打算干预在参拜靖国神社这种问题上的争执，或者韩国和日本在独岛（竹岛）领土问题上的争执，但是它对日本没有能力恢复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失去耐心，因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政策说到底是不允许任何国家或力量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感到了美国的担忧和压力，同时也想要在国内争取更广泛的政治支持，安倍首相改变了

¹ Ezra F. Vogel, "Comments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ttp://se2.isn.ch/serviceengine/>

² Koji Murata, "The U. S - Japan Relationship: A Japanese View". <http://se1.isn.ch/serviceengine/>

其前任的对华政策，于2006年10月8日访问了中国，9日访问了韩国。这种做法使其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细川护熙担任首相以来选择美国之外的国家做首访对象的第一位日本首相。不过，其访问并不完全是出于缓和同中国关系的意图，还与加强美日同盟密切相关。安倍的访问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甚至白宫的高度评价，而美国历来很少对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进行官方评价。¹

日本已经开始脱离“吉田主义”的和平主义。虽然日本的安全战略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内政治斗争、社会变化、体制改革的因素，²但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加强对日本承担安全责任的要求，抬高日本在美国亚洲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是一个关键的外部因素。

有迹象表明，九一一之后布什总统制定的总体对日政策和其任职后期促进中日改善关系的态度将在新任总统奥巴马的领导下延续。新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2月3日访问日本时，称日本是一个“在世界上负责任的行动者”，并希望美国和日本能够在处理各种问题上共同努力，包括全球经济危机、气候变暖、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她说：“我相信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我们具有某些非常重要的责任来努力克服当前的经济危机。”“在应对全球变暖、清洁能源、恐怖主义、核扩散等问题时面临的挑战，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日之间的强大伙伴关系，我们能够成功。”但同时她也强调：“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发展同中国的积极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对中日和中美关系这样的定位，可谓是接受了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对日政策所造成问题的教训。

结 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值得注意的、关于中、美、日三边关系

¹ Michael J. Green and Shinjiro Koizumi, “Abe Shows the Rights Stuff, Comparative Connection”, a Quarterly E-Journal on East Asian Bilateral Relations http://www.csis.org/media/isis/pubs/0604qus_japan.pdf

² 关于上述国内因素，有学者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参见 Richard J. Samuels, “Japan’s Goldilocks Strategy”, pp. 111-127.

» “Clinton Praise Strong U. S.-Japan Ties”, *The Daily Yomiuri*, Tokyo, February 18, 2009

的要点:

第一，无论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之后，与日本在安全上的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日本国内政治精英和近年来日本民众基于对自身安全需要和国际格局变化的看法，以及对美国政策做出的反应，是影响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在后冷战时期，虽然两极对立消失了，美国从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任意采取政策。地区安全格局及其变动对于一个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战略以及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美国在不同地区的安全政策也受到这些地区安全格局及其变动的限制。

第三，虽然美国想要在全球战略中强化美日同盟，但又担心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和美日同盟关系的强化会恶化日本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时，美国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又极其需要中国的合作，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美国不愿看到中日对抗威胁到东亚地区的共同关注、地区经济的增长与繁荣，更不愿看到这种对抗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使得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日和对华政策。

第四，“三角关系”是由每一个双边关系对其他两个双边关系的影响力所构成的。在中、美、日这个战略三角关系中，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都会随着他们同第三国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在当今世界更为明显。由于国家是国际舞台上的理性行为体，他们都在三角关系变化的限制中寻求最大的安全。这就提醒我们，在考虑双边关系时，必须连带考虑另一国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同时不能忽视这一双边关系对彼此同第三国的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

The U. S. Policy towards U. S.- 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Arrangements and its Impact on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Zhou Qi

Abstract : Be it during the Cold War or after the Cold War, the U. S. policy towards Japan has always been founded on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arrangements between the two states.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U. S.-Japan security arrangements have faced very different strategic demands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ing glob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In response to these demands, Washington has pressured Tokyo to take up greater region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responsibilities. The pressure has since mounted further, especially after the 9/ 11 terrorist attacks. Taking that Japan's reactions to the U. S. have strong bearings on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this turn in U. S. policy has been detrimental to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On the Japanese side, it has encouraged the growth of conservative nationalist element, leading to Japan's push for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to achieve the status of "normal state"; on the Chinese side, it raises China's concern over the long-term strategic intents of the U. S.-Japan alliance, and indirectly rouses Chinese nationalism against Japan. However, both Washington and Tokyo have realized that worsening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not only affects U. S.-Japan relations, but also undermines the respectiv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 S. and Japan. The U. S. policymakers now see the need to balance its policies towards China and Japan.

Keywords: US-Japan Alliance / U. S.-Japan Security Cooperation / Sino Japanese Relations

Author: Zhou Qi,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